

当代

李自雄 著

文艺学问题 研究与探索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山东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艺学问题研究与探索

李自雄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艺学问题研究与探索/李自雄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7-5331-7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022 号

责任策划:刘旭东

责任编辑:武迎新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250100

电 话: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泰安金彩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1.75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当代文艺学问题研究与探索	(1)
-----------------------	-----

文学批评

文学的大众化设想	(7)
关于当代文学表达“中国经验”的一种反思	(12)
“画那张画的就是我啊!” ——徐鲁自选集《沉默的沙漏》之与徐鲁	(23)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刘元举的百万字钢琴作品之与刘元举	(28)
赵玫盛唐历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文化意义	(32)
期待文艺批评的理论创新	(38)

文学理论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	(43)
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检讨	(55)
论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	(69)
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	(80)
中国形而上学传统与现代文学本质观念的历史嬗变	(91)
论“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重建	(97)
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重建 ——近十年来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念所引发的理论探讨述论	(111)
值得追问的“中国问题” ——兼与王伟博士商榷	(122)



关于反本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

——兼答王伟博士 (129)

中国问题、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 (137)

美学思考

概念、价值与话语

——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研究问题反思 (157)

论中国生态美学的原生性及其美学形态 (164)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构建的里程碑

——读曾繁仁先生《生态美学导论》 (173)

论新闻的美学原则 (177)

后 记 (182)

导论:当代文艺学问题研究与探索

我们探讨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不是目的,而是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某种可能的方式。法国思想家莫兰曾说:“一个理论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②可以说,理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的思考、回应及对现实问题的解答。就文艺学研究而言,我们的理论思考就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与文艺审美现状及问题,并作出有力的理论回应与有效的理论应答,而构成我们对当代文艺学问题研究思考与理论探索的题中之义。

基于上述这样一种考量,如果我们承认,任何问题,包括文艺学问题,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而非仅仅就是抽象的存在之物,所以不能仅仅对问题作某种抽象的理解,或是脱离语境的理解,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思考与问题研究做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并以之为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本书即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追求之下,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考三个方面对当代中国文艺审美现状及问题作出研究思考与理论探索,以期为当代文艺学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理论参考。曾繁仁先生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③,赖大仁先生也曾有对唯物史观视野在文论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②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③ 详见曾繁仁:《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审美观》,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当代美育建设》,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艺学建设》,载200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美学理论发展》,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坚持与发展结合,理论与实践统一》,载《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阐释^①，显然，如何做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应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视野的理论要义。但值得反思的是，目前学界有两种极端化的研究倾向：一是满足于概念与逻辑的空疏推演；二是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停留于历史考证式的研究。

王元化先生说：“数十年来，在思想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即所谓以论带史。研究问题，不从事实出发，不从历史出发，而从概念和逻辑出发。这一风气不限于史学界，而且是弥漫在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在生活中。后者带来的深刻教训是使人不会忘记的。运动中妄加给人的罪名，往往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根据逻辑推理作出的。所以后来我在讨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时，曾以审案为例。我说应当强调法律上的‘证据法’，而不能根据逻辑推理，或根据我国传统审案的所谓‘自由心证’。因为在审案中根据逻辑推理可以构成的罪行，在事实上却往往是无辜的，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②他又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③

王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很明显是针对目前学界前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而言的，这在现在的文艺学研究领域，在一些操持西方话语的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也使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西来”的话语与概念出发，由这些话语与概念自生出许多与我们本土理论问题无关的“假问题”，而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从基于中国具体历史语境的研究思考中生发出来，或是揭示出来，正如有学者曾形象地指出的：“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术语衣装演练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④这种情况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们对当代中国文艺审美现象及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上，对此，我们在本书中将结合学界研究作出反思。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和逻辑虽然并不是“同一的”，逻辑不能也不应代替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能以“历史”的名义取消逻辑；否则，就会走向后一种极端而流于历史考证，只会导致我们“必须处处跟随着”历

① 详见赖大仁：《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意识形态与文艺》，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体现》，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唯物史观视野与当代文艺批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② 王元化：《我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学术集林》卷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③ 王元化：《自述》，《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④ 林岗：《语言变迁与20世纪文论》，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史,这样“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①,进而丧失理论应有的建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逻辑和历史又应是并必须是统一的,科学的抽象是必要的,只是这种抽象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历史事实中得来,而不仅仅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

这种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思想进程要从历史出发,即“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在本书中,我们将力图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审美问题及相关理论思考进行这种历史的考察,把理论思考和分析建立在坚实的具体语境与现实基础之上,而不只是简单的概念罗列与推演(尽管概念的逻辑的分析也是需要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③,因此,需要在,也只能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找到依据,并加以揭示。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④

当我们由此展开我们的理论探索时,也许正如哈桑所说的,同样“既需要一种历史的、又需要一种理论的界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时期’通常就根本不是一个时期,而是一种历时兼共时的建构”^⑤,而我们的理论探索也将是这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⑤ [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盛宁译,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文学批评



文学的大众化设想

大众文学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流变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历史阶段:由古典时代的萌生与演变,到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开端的现代时期的发展与消长,而至新时期以来的复苏与勃兴,特别是后现代历史语境的如火如荼发展态势。尽管也许在其所处的历史境遇,大众文学常常被排斥在文学场的中心位置之外,但它在另一历史语境下却往往被解读为经典,而被置于文学场的中心位置。众所周知,在古典时代,《诗经》所呈现的文化场中心,无疑是通过“雅”与“颂”来标举的,而不是被后来奉为“经典”的“风”。因为我们不难发现,“风”里的作品不少是冠以“后妃之德”的名义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存在的。而后来作为大众文学样式的词曲、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如此。再如五四白话小说,在当时“正统”的文学史家看来,是不足入流的。鲁迅的白话小说作为当时“平民的大众文学”名目下的一员,尽管也曾被为数不少的人视作不入流,甚而不齿,因为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经典意义可言的,典型的如林纾,但这并不妨碍鲁迅现代白话小说“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如上所述,这种“大众”与“经典”的历史误读及其互变,无不说明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大众文学,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极有可能被视为经典之作,大众文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范畴,却往往孕育着文学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别是在价值日益多元的当下,中国文学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引入,也许是适时而更为有效的。面对大众文学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应用历史的眼光对其发展抱更多的乐观态度(当然,也不能无视现实而盲目乐观),注意到它的中国特色与发展可能。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对于后现代主义,如果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来看,其进入中国大地,是起到了解放思想作用的。这种理论对中国文学界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其出现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新思潮,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新写实主义。这些新思潮所代表的写作路向,尽管往往被一些批评



家归结为“平面的写作”、“深度的取消”，而一棍子打死，却丝毫不妨碍其可喜一面的存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文学中的引入，特别是在开放的文学境域中，完全可以通俗和适当“深度”的结合，甚至不拒绝“启蒙”。这无疑能够打破固有精英主义所坚持的单一衡量标准，而且也可看作是对“雅”“俗”二元对立的文学解读模式进行解构，从而为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一种融合论的大众化设想。

而这种融合论的大众化设想的最终实现，要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需要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参与其间，为文学启蒙精神的不竭注入提供“资源”的可能；二是需要参与进来的精英知识分子改变旧有的俯视大众的启蒙姿态，采取“平民化”的写作姿态与启蒙策略，从而为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是需要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参与其间，为文学启蒙精神的不竭注入提供“资源”的可能。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性始终有向善向美的一面存在，特别是在物化的环境中，尤其如此。正如李洁非所指出的：“既然物化导致人的不完整、自我分裂，导致人性异化，所以它不可能不激起心的觉识和反抗。这不需要由外力予以推动，当物化现实对心灵的压抑所造成的痛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这样的觉识和反抗将自主地从人的情感意志产生、爆发，而且物化得越厉害，反抗也将越强烈。实际上，人在物、心两者之间一直不自知地维持着某种平衡，不管其中哪一方面出现匮乏和亏缺，这一平衡便遭到破坏，从而引起恢复和重建平衡的人性冲动。我们知道，目前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遍甘于物化的气氛，正是人们的物欲长期被压抑、被剥夺、被禁止的合理后果——抑郁太深，以致一旦开禁，对物欲的追求就近乎疯狂和病态。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断定，这种矫枉过正的物化狂热已经潜伏着它的反作用；亦即遭到践踏、搁置的心之存在，势必从人的自我内部起而抗争，结果，在最赤裸裸的物化现实里，反而最有可能出现骄傲、高贵和真正纯澈的心灵。”^①物化中的人，对于精神道德的自我追求，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天然的、本能的、无可抗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启蒙”精神的存在与注入，是人性的本质要求使然，遑论自觉意识敏锐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由于精英文人们的参与，其作为这种文学的生产者，是能适当提高产品的艺术品位和增加文化含量的，这无疑有利于这种文学样式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提高读者大众的欣赏水平，还有助于开发个体的人的智能和提高社会群体的文化品位。文化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人类文明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至于完全沦落为只关注当下、只重过程不管结局的及时行乐的“群氓文学”，精英们参与大众文学，

^① 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



变消极防守为主动出击,抢占文学市场,并若能为之作出“提升”的努力,是“功莫大焉”的文学幸事。反之,在这个大众社会,如果一味排斥这种拥有广大市场的大众文学,无疑会导致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欣赏品味的脱节,而出现巨大审美真空,一些庸俗下作的东西就会穿着大众的“服饰”充斥文化市场。这也是每一个尚有社会良知的精英知识分子都不愿看到的。可以说,文学的“启蒙”精神的存在,是人性层面的某种本质欲求,特别是在当下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之中,愈是如此,并会由于知识分子的参与和不竭“资源”的提供,表现得愈加突出。这无疑为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种种美好的想象。

而这毕竟只是某种美好的想象,更重要的是,需要参与进来的精英知识分子改变旧有的俯视大众的启蒙姿态,采取平民化的写作姿态与启蒙策略,从而为之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这种启蒙姿态的变化与写作策略的调整,取决于旧有的启蒙话语本身所固有的弊端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定位。

众所周知,旧有的启蒙话语是以对“现代化”的壮丽辉煌图景的许诺而获得大众认可的生存执照的,而建构这种“现代化”所依据的理性本身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功利欲望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其可靠性能达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况且,即便存在着这样能统领一切的理性,时至知识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接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亦只能日趋专业化,旧有启蒙话语下曾一度美好的“全知全能”的知识分子想象,在现实的遭遇下,已不让人抱有幻想。知识分子在知识膨胀的历史境遇下日趋见“小”,“包揽一切”的未来宏图设想已并非是个别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事。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若处处还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英意识与“救世主”姿态的精英文人自居,试图充当“群氓”的教师爷甚至精神导师,在这个文学接受市场裁决的时代,他的“精神”成果就极有可能遭遇这样一句流行的话:“你以为你是谁?”可能还会加上一句:“怎么着,我不买还不行吗?”可以说,真正的智者是放下启蒙导师架子进行启蒙的智者——这是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语境下,每个习惯于俯视大众的精英知识分子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太过小觑读者大众,无疑是老黄历下的“精英主义”在作祟。

我们可能不会忘记那场沸沸扬扬的朦胧诗潮,尽管当时很多读者都说读不懂,可喜的是朦胧诗人并没有完全“媚俗”,坚持了下来——当然,这种坚持并不是内容上的非平民化,追求意义的深刻与玄奇,而是表现方式和作诗技法上的适度高于普通接受者,特别是在语言方式上追求“朦胧”的“弹性”,最终却为读者所接受。可以设想,如果朦胧诗人如当下的所谓“精英”文人那样坚持所谓“意义”的高深,他们遭遇的,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就无从获取话语权而失去立足之地,遑论今天能得到人们的承认。这个文学事实,对当下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大众文学



的创作平台上,采取何种方式参与现实的文化实践也不无策略意义。其实,后现代文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之际,最初的一些作品就显露出了部分中国文人敢为人先的这种努力。打头的,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这部小说与后继也被列入后现代主义名目下的王朔、朱文等的小说相比,其“触目惊心”程度,在一些“精英”人士看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得一提的,以致习惯于人分几等文分几样的中国批评家们,对王安忆写作的身份类属也是颇觉游移并犹疑的。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部小说很明显没有达到所谓“精英”们所预设的理想深度,因而招致诸多诟病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即便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这个标题,也被一些“精英”人士定位为“颇具煽情挑逗意味的字眼”以“刺激诱人”,尽管作者自称是为了象征“大地”和“母亲”。^①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不少“精英”人士定位为十足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王朔,在2001年有关对知识分子评价的一段话是饶有意味的:“说到知识分子,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的人,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我攻击的知识分子就是这帮人,只不过那时,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②这无疑为他一直让人“质疑”甚或“误解”的“文学立场”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

诚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精英文人注意到了这种“平民化”的写作姿态与“启蒙”策略所具有的优越性,并付诸自身的文学实践。这无疑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理念增添了更为实质的内涵,尽管这种理念在理论形态上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被不少人认为势必导致“平面的写作”,但这些人无疑忽视了其更为重要的另一面——由于知识分子的参与,其建构的那种不容否定的个性化启蒙叙事方式,很明显是和热衷于以救世主姿态追求宏大叙事的所谓“经典”启蒙话语不同的,然而最终导致的也正是在维护启蒙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无数微小而又不无价值的个人声音,实现着对“真理”的多元体认,共同推动对认识客体的“真理性”认识不断趋于完善。无疑,其间所体现的社会人文关怀方面的本质,和现代社会价值秩序赖以运作的本质是相一致的,因而具有切实的可行性。而这对文学在新的处境下怎样寻找同现实切实有效的结合点,使“启蒙”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也能够更好地得以深化,不是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探索吗?“雅”与“俗”、“大众”与“经典”,从来就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对其一味地加以二元区隔,甚至对立的理解,无疑是有违文学发展的“历史本质”的认识的,

① 参见莫言:《〈丰乳肥臀〉解》,载1995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② 王朔、王童:《王朔在线》,载《小说界》2001年第2期。



更是不合时宜的。当下行进于后现代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可以说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文学生态环境。这种文学发展与研究的融合论设想,正通过越来越多的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的文学实践而变成可能,当然,他们由此“立场不坚定”所招致的“精英”们的声讨依然存在,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我们不敢妄言他们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文学成绩和产生了多大的文学影响,但他们的文学践行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写作与研究姿态看作是我们的文学复兴之梦,是固有经典体系行将倾覆的“涅槃”。

(原载《当代文坛》2005年第2期)

关于当代文学表达“中国经验”的一种反思

目前学界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后莫言时代”。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但无论是对于莫言还是对于中国文学,这都只是一个开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新时期以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大国的崛起步伐形影相随的诺贝尔情结,以及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杆的文化认同焦虑,并没有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莫言的获奖而消解。”^①而作为某种呼应,当代文学要表达“中国经验”的呼声也再度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与至今未绝的热议。客观地说,这一呼声与表述,从“中国经验”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学的可能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理论界对“本质主义”的省思与忌讳,无疑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重建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而走出凌空蹈虚的误区。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值得追问,并由此构成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反思,即:当代文学要表达的究竟应是什么样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的表达如何才能为我们提供令人期盼的可能?对此若不予以厘清,就极有可能步入新的误区。

—

对于“中国经验”,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它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文学,甚至可以说是远远超出文学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越界的产物。为了便于我们的理解,我们不妨在这里作一下简单的梳理。

“中国经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最初的理论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约书亚·库珀·拉默(又译乔舒亚·库珀·雷默)所提出的“北京共识”。从某种意义上

^① 龙慧萍、冯雷:《六代学人济济一堂,开创莫言研究的新局面——“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载2014年1月15日《中华读书报》。